

生命完整之路

◆ 撰文 / 何日生

美國文化學家房龍寫過一個寓言，有一個人死後來到上帝面前，上帝審判他：「你一生為惡者多，你是否認罪？」

那人說：「我認罪！」

「那我應當判你下地獄。」

那人回答說：「祢不能！」

上帝說：「為什麼不能？」

「因為我一直就活在地獄之中。」

「那難道我必須判你上天堂！」

「不！祢也不能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我無法想像天堂存在何處？」

那人回答說。

房龍的這段寓言道盡西方的現代人在失去上帝信仰之後，無可奈何地墮入罪惡與虛無之深淵。這虛無的、價值空洞的感受，導致當代人處在一個孤寂、無助、無根的生命狀態。

十四世紀西方世界的基督教文明由於教會的問題叢生，宗教改革的浪潮逐漸從義大利數個城邦發軔，他們反對教士特權，反對教廷干預世俗事務。到了十六世紀德國的馬丁路德，所提出的新教理念，強調個人直接面對上帝，而不是傳統的教會是上帝與人的橋樑。個人可以直接領略上帝的意旨，個人是否是上帝的選民或能否獲得救贖，是歸屬於上帝，而不是教會能裁奪。教皇的力量

式微，新教的結構較為鬆散，個人的能量與自由獲得更多程度的鬆綁，這加速孕育文藝復興的浪潮。宗教改革與城市興起的力量是互為因果。在教廷權力式微之後，一種以上帝為中心的超越自然的宇宙觀相對殞落，以科學精神為主體的自然宇宙觀與以人為中心的人文主義抬頭，在十七、十八世紀，綻放它們耀眼的光芒。

文藝復興的精神其實是恢復希臘理性的思惟價值，一如佩拖拉克舉西塞羅讚美蘇格拉底的話說：「感謝蘇格拉底，把哲學從天上帶到地上。」以人為本的思惟曾開啓了人類社會長達數個世紀的文明之光。

文藝復興之後的科學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發達，自然為人類開啓全新的生活樣態，它們決定性地扭轉人類自身存在的獨特智慧與價值，並以此基礎，自信與樂觀地邁向永恆的未來。然而這套以希臘為主體的價值體系，二元思惟，有其客觀化與累積知識的便利，但也有其無可彌補的缺憾與障礙。

希臘為主的思惟體系是以二元論出發。希臘思想的理性思惟從柏拉圖以降，就一直處在二元對立的困境之中。在《費多篇》裡柏拉圖把「感官」與「理性」相對，「至善的理性」與「易變動的事物」有別，肉體與靈魂，乃至

善與惡、形上與形下都相對立起來。在基督教思惟體系裡，上帝與人不同，也是二元論的思惟。西方思想體系最大的難題與矛盾正是主體與客體分離、人與物、人與上帝分別對立的問題。這種體系從哲學出發，衍生到法律上以權利與義務的相對立，勞資雙方相對立，行政立法相對立，個人與團體相對立，人與自然相對立，這都是二元思想分化出來的社會體系與生存狀態，而這體系在今日深深地支配著整個世界。

二元對立在思想上是難解的議題，在現實上也帶給人類的存在一種根本的孤獨與無助。區分的思想造就專業，但是專業一如德國法學家所戲稱的法律定義，就是要將一根頭髮分析成三千根，這種區分，這種非統合的思想體系，人逐漸被放置框限在局部的、相對的、細微的、繁複的、某種被稱為專業的小小的格子裡。你逐漸變成你的專業與職位，變成專業知識的一個工具。真正的你不見了，我是會計師，我是律師，我是醫師，而不是誰的兒子，哪一個族群，或哪一種信仰體系下的人。人的主體被細微而繁複的專業系統所取代，人與團體，人與大我也漸次遠離。隔行如隔山，專業的壁壘讓人無法溝通。

慈濟學所彰顯的是「以一種不對立的方式建構社會的善，建構人的善」。「以不批判的方式消除惡」。惡，並不是不面對，只是以善的方式將個人與社會中的善逐步引導擴大，以致最終讓惡逐漸式微與消除。對立、批判，就落入

二元思想，二元思想就永遠帶領人類遠離彼此，遠離生命本身的完整。當社會的結構不是建立在制衡與競爭之上，我們對於人性的看法就必須改變，我們要相信人之善，只是這善如何透過智慧去引導出來，如何透過群體的努力建構更多的愛的實踐場域，讓人在這些場域中逐步擴大他們自身本具之善。

慈濟學作為愛的實踐場域，其創建模式依序是：

情感引導：「經由人與人之間的情感，引領個人去接觸一切生命」；親身接觸：「從接觸一切生命，去激發個人自身本自具足的愛」；愛的啟發：「經由愛的啟發，引領出的行動與實踐」；實踐強化：「經由實踐，獲致情感的啟悟」；觀念確立：「經由情感的啟悟，建立堅定的思想價值體系」；人格形塑：「經由思想價值的確立，形塑了個人之人格」；團體行動：「經由人格的建立，逐漸擴大富有行動力的大愛團體」；建構社群：「在團體的大愛付出中，建構一個更臻完善的社會」；終極理想：「經由完善社會的建構，一個個完整生命才能逐漸成行」。

最後，在這種「無私大愛」的價值不斷地體現與強化中，期望個人與社會能最終達到生命至高的完整性，亦即「與萬有合一」的「寂靜能動」的永恆境界。

